

格赖斯的意义理论与无穷倒退难题*

何 杨

(中山大学,广州 510275)

提 要: 格赖斯主张用说话者意图解释说话者场景意义, 提出分析说话者场景意义的 3 个充要条件, 然后再用说话者场景意义解释语句意义。该意义理论将面临难以避免的无穷倒退难题, 格赖斯和希弗的解决方案皆不足以完全处理这一难题。

关键词: 格赖斯; 意义; 意图; 无穷倒退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4)03-0008-5

Grice's Theory of Meaning and Problem of Infinite Regress

He Y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Grice proposes to explain the utterer's occasion-meaning in terms of the intentions of the utterer. He maintains that there are thre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analyzing utterer's occasion-meaning. Consequently, he uses the utterer's occasion-meaning to explain the sentence-meaning. However, the theory of meaning is difficult to avoid the problem of infinite regress. Furthermore, neither of the strategies provided by Grice and Schiffer could solve the hard problem in a successful manner.

Key words: Grice; meaning; intention; infinite regress

意义问题是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在语言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类意义理论, 即真值条件论和交流意图论。两者的基本差别在于表达式(包含专名、通名、描述语和语句等)意义和说话者意义孰为根本的问题。真值条件论主张语句意义就是语句的真值条件, 语句意义是基本概念, 只有在解释了语句意义的基础上才能解释说话者意义。这种理论一直占据 20 世纪上半叶的主流。然而, 随着日常语言学派的兴起, 尤其是格赖斯(P. Grice)于 1957 年发表《意义》一文, 交流意图论挑战前者的主流地位。格赖斯将意图引入意义分析中, 从说话者意图出发分析说话者意义, 进而说明表达式意义。这种意义分析的路径也遭到了诸多反驳, 其中讨论最多的则是格赖斯的意义理论将面临无穷倒退难题。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展开梳理, 并讨论格赖斯和希弗(S. Schiffer)给出的两种解决方案, 由此观照其理论困境。

1 格赖斯的非自然意义理论

首先, 格赖斯区分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 考虑以下 4 个语句(Grice 1957):

① Those spots mean (meant) measles.

② The recent budget means that we shall have a hard year.

③ Those three rings on the bell of the bus mean that the bus is full.

④ That remark, "Smith couldn't get on without his trouble and strife," meant that Smith found his wife indispensable.

①和②是自然意义, ③和④是非自然意义。区分的依据来自于格赖斯给出的 5 个特征: 以特征(1)为例, 如果 x 在自然意义的涵义上意味着 p (x 指对象, p 指一个命题), 那么就能推出 p 。而在非自然意义上, 则从 x means that p 不一定能推出 p 。例如, 从“那些斑点意味着麻疹”可以推出“他得了麻疹”, 而从“公共汽车上的 3 声铃响意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左传》辞令的逻辑研究”(2012M511875)的阶段性成果。

味着满载”却不一定能推出“汽车满载”,因为很可能是司机按错了,事实上汽车并没有满载。

在区分了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以后,格赖斯着重探讨了后者。为了方便,我们把非自然意义上的意味简写成意味 NN。首先,他区分了非自然意义的 6 种类型(Grice 1968, 1969):

⑤ a. x 意味 NN 着某些东西(x 表示完全陈说(utterance)并且在特定场景下)

a1. a 意味 NN 着某些东西(a 表示部分陈说并且在特定场景下)

b. x 意味 NN 着某些东西(x 表示完全陈说并且在脱时(timeless)情形下)

b1. a 意味 NN 着某些东西(a 表示部分陈说并且在脱时情形下)

⑥ A. S 通过 x 意味 NN 着某些东西(在特定场景下 S 表示说话者)

B. S 通过 x 意味 NN 着某些东西(在脱时情形下)

他也将⑤b 称为完全陈说类型的脱时意义,⑤b1 称为不完全陈说类型的脱时意义,⑤a 称为完全陈说类型的应用脱时意义,⑤a1 称为不完全陈说类型的应用脱时意义,⑥B 称为陈说类型的场景意义,⑥A 称为说话者场景意义。然后,格赖斯主张前 5 种意义都可以在说话者场景意义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说话者场景意义又可以在说话者意图的基础上进行解释,因此最终所有非自然意义都可被解释为意图概念。

其解释非自然意义的整体思路是:首先根据说话者的意图来解释说话者场景意义,然后再用说话者场景意义来解释陈说类型的场景意义,而说话者场景意义又大致等价于陈说类型的应用脱时意义,最后再用陈说类型的应用脱时意义解释陈说类型的脱时意义。考虑到说话者场景意义与陈说类型的应用脱时意义的大致等价,简言之,在考察言语陈说时,我们也可以把格赖斯解释意义的步骤看成是:首先根据说话者意图解释说话者场景意义,再用说话者场景意义解释语句意义(脱时),从而语句意义最终在说话者意图的基础上得到解释。

下面,我们考察格赖斯分析非自然意义的具体步骤。首先,在格赖斯看来,说话者 S 通过说出语句 x 意味着某些东西为真的充要条件为说话者 S 通过说出语句 x 想要:(a) 在听者 A 身上引起某种反应;(b) 听者 A 认识到他说这句话背后的意图;(c) 听者 A 对 S 的意图的认识对为何听众 A 会产生反应至少起到一部分的解释作用。例如:

⑦ 米勒想通过说出“琼斯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

政人员”意味着琼斯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人员。

语句⑦为真的充要条件是:(a1) 米勒想要通过说出“琼斯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人员”这句话使戴维斯相信琼斯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人员;(b1) 米勒想要通过说出“琼斯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人员”这句话使戴维斯认识到他说“琼斯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人员”这句话背后的意图;(c1) 米勒想要通过说出“琼斯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人员”这句话使戴维斯对米勒的意图的认识对为何戴维斯相信琼斯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人员至少起到一部分的解释作用。

格赖斯(1969)也给出过一个更为简洁的表达,即“说话者 S 通过陈说 x 意味着某些东西”是真的当且仅当对听者 A 而言 S 陈说 x 想要:(a) 在听者 A 身上引起某种反应 r;(b) 听者 A 想到(意识到) S 的意图(a);(c) 听者在实现(b)的基础上实现(a)。此外,格赖斯(1957)也将说话者意义的涵义解释为“S 通过 x 意味着某些东西”(大致)等同于“S 想要通过说出 x 来使听者由于认识到这个意图而产生某些效果”;而我们可以补充说,问 S 意味什么就是寻求对所意想的效果的说明。

解释了说话者场景意义后,格赖斯接着解释语句意义(脱时)。考虑⑧为真的充要条件:

⑧ 语句“琼斯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人员”(脱时)意味着琼斯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人员。

格赖斯认为⑧为真当且仅当句记(tokens)“琼斯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人员”有规律地或约定地(conventionally)与说话者的意义琼斯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人员相联系。当然这一句记可有其他用法,如一个说话者可以用它来意指琼斯被选为行政管理官员。但那是非约定的,是例外的,而不是标准的。这就是格赖斯对语句意义的所谓“约定+说话者场景意义”的解释。由于说话者场景意义是由说话者意图来解释的,因此格赖斯对语句意义的解释也可以看作是“约定+意图”的解释。

2 无穷倒退问题的提出

现假设在二战中,一名美国士兵被德国士兵俘虏,这名美国士兵掌握许多重要情报,美国士兵知道德国士兵想要从他那里获取这些情报。为了获取情报,德国士兵试图通过使用拇指夹来拷问美国士兵。在此情况下,格赖斯所提出的 3 个条件都是满足的,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德国士兵通过使用拇指夹意味着美国士兵说出情报。因为拇指夹并没有揭示德国士兵的意图,拇指夹只不过是一个诱导物,美国士兵本来就知道德国士兵想要

他说出情报,即使没有使用拇指夹,美国士兵也知道德国士兵想要他说出情报。为了避免陈说只是诱导物的这类反例,我们需要规定听众认识到说话者的意图至少部分地来自于陈说。这样,我们有说话者S通过陈说x意味着某些东西当且仅当S陈说x想要:(a)在A身上引起反应r;(b1)使A由对x的陈说至少部分地意识到S想要引起这种反应;(c)A对S的意图(a)的认识对在A身上引起反应r至少起到部分解释作用。

在上述反例中,由于美国士兵对德国士兵意图的认识不是来自于拇指夹,所以不满足条件(b1)。是否修正后的3个条件就能充分说明说话者场景意义呢?斯特劳森(Strawson 1964)最早对此提出质疑,他构造的反例是:S通过自己的行动意图引起A的信念p(满足条件(a))。S在A肯定能看见的地方安排了p的令人信服的可视证据,而且S在安排证据时知道A正在看他安排证据,并知道A不知道S知道A正在看他安排证据。S意识到A不会把安排的“证据”看作是p的真正证据,并且意识到也确实意图使A将S对“证据”的安排看作是相信S意图引起A的信念p的基础,这也就是说他想要A认识到他的意图(a)(满足条件(b1))。最后,S知道A确信S的可依赖性,并且S知道A相信除非确实存在情况p,否则S不会使A相信p,因此A对S的意图(即S想要引起A的信念p)的认识是他相信p的理由(满足条件(c))。

现在,我们可以模仿斯特劳森的反例模式构造一个反例,考虑如下情况:假设我和张三是一起好朋友,并且都相信超自然的力量。现在张三想买一套房子,而我认为张三正考虑买的房子里闹鬼。我试图通过下述策略使张三相信房子里闹鬼:我放一盒发出鬼声的录音带,并且把它藏在房子里,当我做这些的时候,张三都能看见。此外,我知道张三可以看见我,并且知道张三不知道我知道我正在看他。现在,上述3个条件都是满足的,我通过放录音带想要使:(a4)张三相信房子里闹鬼;(b14)张三由我放录音带这一行为至少部分地认识到我想要他相信房子里闹鬼(因为张三不会把我放录音带看成是房子里闹鬼的真正证据);(c4)张三对我的意图(a4)的认识对张三相信房子里闹鬼至少起到部分解释作用(因为我和张三是好朋友,张三相信我不会骗他,相信除非房子里真的闹鬼,否则他不会使他相信房子里闹鬼)。

现在3个条件都是满足的,是不是可以说我通过放录音带意味着房子里闹鬼呢?显然不是的。斯特劳森认为该例子的问题在于我不想让张三知

道我知道他正在看我放录音带,因此为了说明说话者场景意义,“S不仅要让A认识到他的意图是使A认为p,而且要使A认识到他的意图是使A认识到他的意图是使A认为p”(Strawson 1964)。在上例中,就是我不但要让张三认识到我想要他认为房子里闹鬼,而且要使张三认识到我想要他认识到我想要他认为房子里闹鬼。而上述例子不满足这个条件。这样,我们有说话者S通过陈说x意味着某些东西当且仅当S陈说x想要:(a)在A身上引起反应r;(b1)使A由对x的陈说至少部分地意识到S意图引起这种反应;(c)A对S的意图(a)的认识对在A身上引起反应r至少起到部分解释作用;(d)A应当认识到S的意图(b1)。

现在的4个条件又是否足以说明说话者场景意义呢?斯特劳森保持了一种谨慎态度,对此表示怀疑。后来,希弗(1972:18-19)对此又提出了进一步的反例,认为上述4个条件仍然不充分。考虑下述情况:假设S与A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并且只有S和A两个人。S想让A离开房间。S采取的做法是用很难听的声音唱“迈阿密上空的月亮”这首歌。S希望A相信S试图通过难听的歌声摆脱他,又希望A离开房间的理由使A认识到S想要他离开房间。现在,上述条件都是满足的,S通过使用难听的声音唱“迈阿密上空的月亮”这首歌想要使:(a5)A离开房间;(b15)A至少部分由难听的歌声认识到S这样歌唱的意图是使他离开房间;(c5)A对S的意图(a5)的认识对使A离开房间至少起到部分解释作用;(d5)A认识到S的意图(b15)。

现在问S通过唱“迈阿密上空的月亮”这首歌是否意味着A离开房间。希弗认为不是的,此处存在一对矛盾,即想要A离开房间的理由与想要A认为S想要A离开房间的理由之间的矛盾。在上例中,一方面,想要A认为S想要A离开房间的理由在于S难听的歌声;另一方面,想要A离开房间的理由在于A认识到S想要他离开房间。为了排除上述矛盾,希弗建议添加一个条件(e),从而有说话者S通过陈说x意味着某些东西当且仅当S陈说x想要:(a)在A身上引起反应r;(b1)使A由对x的陈说至少部分地意识到S意图引起这种反应;(c)使A对S的意图(a)的认识对在A身上引起反应r至少起到部分解释作用;(d)A应当认识到S的意图(b1);(e)A应当认识到S的意图(c)。

而上述反例不满足条件(e),因为A离开房间的理由在于A对S的意图(即S想要A离开房间)的认识,而可以不考虑S难听的歌声。

是否上述分析就是充分的呢?希弗(1972:

22) 又构造了有关 Tipperary 的新反例, 并且认为这种反例可以无穷地构造下去。当然我们也可以添加新的条件来处理每一个反例。通过斯特劳森和希弗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对说话者场景意义的分析所给出的条件总是不充分的, 我们总可以构造进一步的反例, 而对进一步的反例的处理只要添加进一步的条件, 而且所需添加的条件都具有如下特征, 即说话者 S 的 n 次意图是使听者 A 认识到 S 的 n-2 次意图, 这就是格赖斯意义理论中出现的无穷倒退问题。换句话说, 按照斯特劳森和希弗的分析模式, 对说话者场景意义的分析总是不确定的或无穷倒退的。

3 格赖斯的解决方案

针对无穷倒退问题, 格赖斯(1969) 给出 3 种不同的回复: 其一, 承认无穷倒退问题, 但是无穷“倒退可能是(或将是)良性的, 而不是恶性的; 它可能是(或将是)无害的, 正如从‘Z 知道 p’到‘Z 知道 Z 知道 p’到……这种倒退一样”。不过这种回复只是一种可能, 格赖斯也承认不能确定这种分析中的倒退到底有多么无害, 只是说这种分析中的倒退在于附加新条件以处理每一个阶段所可能遇到的反例, 它既不像下述情况那么明显无害: 无论何时正确地说“p 是真的”, 都可以正确地说“p 是真的这一点是真的”, 依此类推, 同时它也不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那种无穷倒退那么明显有害, 即如果说先有鸡, 那么鸡从哪里来呢? 鸡是从鸡蛋里孵化出来的; 如果说先有鸡蛋, 那么鸡蛋又从哪里来呢? 显然鸡蛋必须由鸡生下来, 这样就会陷入无穷倒退。其二, 承认理论上存在无穷倒退问题, 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反例的复杂性, 使得无穷倒退不会存在。也就是说, 在现实中, 不管是说话者还是听者都不会具有那么复杂的意图。格赖斯怀疑斯特劳森添加的条件(d) 和希弗添加的条件(e) 就已经达到了人们的意图的极限, “所以 S 可能并没有那些对他提出的存在强迫添加进一步限制的意图。不仅 S 对 A 所需要的算计非常困难, 而且他要向 A 做出暗示表明他的算计也是不可能的, 即使这些都为 A 所意识到。所以, 我们不得不出这种结论: 这里并没有包含任何倒退。”其三, 承认存在无穷倒退问题, 但我们可以理论上解决无穷倒退问题。格赖斯认为“这里我们所提到的所有潜在反例都包含着构造出这样一种场景, 即根据 A 应该得到预期反应的假设, S 意图使 A 既依赖于某个‘推论因素’(某些前提或某个参照步骤) E, 又想到 S 意图使 A 不依赖于

E”。我们可以通过禁止 S 具有这种复杂的意图来消除潜在的反例, 即添加附加条件: 不存在推理要素 E 使得 S 陈说 x 的意图既满足(a0) 听者 A 对 r 的确定应该依赖于 E, 又满足(b0) 听者 A 应当认为 S 意图使(a0) 是假的。(Grice 1969)

4 希弗的解决方案

格赖斯的回合理吗? 希弗对此持否定态度。比如, 在“迈阿密上空的月亮”这个例子中, 下述说法是对的: S 想要 A 的信念(即 S 想要 A 离开房间) 是 A 的实际推理中的推理要素, 而且 S 想要 A 认为 S 并不想要 A 的信念(即 S 想要 A 离开房间) 是 A 的实际推理中的推理要素。但是,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 A 认为 S 想要 A 不把他的信念(即 S 想要 A 离开房间) 当作他离开房间的推理要素。因为可能存在下述情况: A 以为 S 用难听的声音唱“迈阿密上空的月亮”这首歌与 A 是否离开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S 这样唱歌只是期望能对 A 离开房间起点推动作用。这样的话, 该反例仍然存在。

希弗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他建议在格赖斯源初分析的 3 个条件上添加他所谓的“共有知识条件”(mutual-knowledge condition)。粗略地说, 说话者 S 和听者 A 共同知道命题 p 当且仅当 S 知道 p, 并且 A 知道 p, 并且 S 知道 A 知道 p, 并且 A 知道 S 知道 p, 并且 S 知道 A 知道 S 知道 p, 并且 A 知道 S 知道 A 知道 p……依此类推。

然后, 希弗举了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假设我和你在餐厅一起吃饭, 我俩坐同一张桌子, 并且面对面地坐着。在桌子的中间摆着一只蜡烛。在此情况下, 我正面对着蜡烛和你, 你也正面对着蜡烛和我。再假设我和你都是正常人, 即有正常的视觉能力, 有正常的智力水平等, 而且我俩都睁开了眼睛。希弗认为, 这样的话, 我和你将共同知道桌子上有一只蜡烛。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我知道桌子上有一只蜡烛。

接着, 我也知道你知道桌子上有一只蜡烛。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第一, 我知道如果一个正常人睁开了眼睛, 并且把他的头对着对面区域内的对象, 那么这个人将会看到他前面的对象。第二, 我知道你是一个正常人, 并且我看到你的头正对着的区域内有一只蜡烛, 所以我知道你知道桌子上有一只蜡烛。

然后, 我并不想假定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上述关于正常人的规则, 因而我也知道你知道当正常人睁开眼睛时, 他们会看见在他们的视域范围内的事物。而我已经看见你睁开了眼睛看着我, 即

看见你看见我睁开了眼睛,并且把头对着,所以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桌子上有一只蜡烛。

就如我知道你知道有关正常人的规则一样,我也知道你有同样的理由知道我所知道的。从而既然我看见你看见我的头对着你的头,而你的头正对着一只蜡烛,所以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桌子上有一只蜡烛。

现在我们可以构造进一步的步骤来说明:基于同样的理由,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桌子上有一只蜡烛。而且这种步骤将可以无穷地构造下去。因为希弗的策略是通过添加共同知识条件来解决无穷倒退问题,而共同知识条件中也会出现无穷倒退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样一种无穷倒退是有害的吗?在希弗看来,这种无穷倒退完全无害。

一般而言,如果某人知道某事,某人就知道他如何知道某事。而如何知道某事又可以被看成是知道某性质对任何人知道 p 是充分的。举例来说,张三知道在他正前方有一辆汽车,张三也知道其他任何人只要站在和他相同或相似的位置就会知道他的正前方有一辆汽车,张三还知道其他任何人只要站在和他相同或相似的位置,就会知道其他任何人只要站在和他相同或相似的位置就会知道他的正前方有一辆汽车。这样,希弗(1972: 34-35)就定义共有知识条件为: S 和 A 共同知道 p 当且仅当存在性质 F 和 G 使得: ① S 是 F ; ② A 是 G ; ③ 是 F 和是 G 对知道 p , 知道 S 是 F , 知道 A 是 G 是充分的; ④ 对任意命题 q , 如果是 F 和是 G 对知道 q 都是充分的, 那么是 F 和是 G 对知道是 F 和是 G 对知道 q 都是充分的都是充分的。

在“蜡烛”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性质 F 可以指: 视觉正常, 睁开双眼, 有意识的人的性质, 而且这个人就是 S , 并且在非常近的距离内直接面对蜡烛和 A , 而 A 也是一个视觉正常, 睁开双眼, 有意识的人, 他在非常近的距离内直接面对蜡烛和 S 。性质 G 与性质 F 相似, 只是在性质 F 中出现 S 的地方, 用 A 代替, 出现 A 的地方, 用 S 代替。

现在, 我们可以添加共有知识条件到格赖斯对说话者场景意义的分析中, 于是有: S 通过陈说 x 意味着某些东西当且仅当 S 陈说 x 想要认识到某事态 E , 该事态的获得对于 S 和听者 A 共同知道(或相信) E 的获得和 E 是 S 陈说 x 的意图((a_2)、(b_2)、(c_2))的决定性(非常好的或好的)证据是充分的: (a_2) 引起 A 的反应 r ; (b_2) A 对 S

的意图(a_2)的认识至少是 A 产生反应 r 的部分理由; (c_2) 认识到 E 。(Schiffer 1972: 39)

在斯特劳森的例子中, S 和 A 不是共同地知道 S 陈说 x , 从而不是共同地知道 S 陈说 x 的意图是通过 A 对意图的认识引起 A 的反应 r 。在模仿斯特劳森构造的房子里闹鼠患的例子中, 张三和李四不是共同地知道张三放出下水道的老鼠, 从而不是共同地知道张三放出下水道的老鼠的意图是通过李四对意图的认识来使李四相信房子里闹鼠患。而在希弗的“迈阿密上空的月亮”的例子中, S 和 A 虽然共同地知道 S 用难听的声音唱“迈阿密上空的月亮”这首歌, 但是不是共同地知道 S 用难听的声音唱“迈阿密上空的月亮”这首歌是想要通过 A 认识到这个意图来使 A 离开房间。所以通过添加共有知识条件, 我们就可以排除那些反例, 从而解决无穷倒退问题。

格赖斯的解决方案存在不足, 希弗的解决方案呢? 笔者以为希弗实际上是通过用另一种无穷倒退(即共有知识中的无穷倒退)取代了格赖斯分析说话者场景意义中的无穷倒退, 只是希弗认为共有知识中的无穷倒退是无害的, 而格赖斯的无穷倒退则是有害的。

实际上, 格赖斯和希弗都发现了无穷倒退产生的根源, 即交流中的欺骗问题, 或者说是交流双方对信息把握不平等, 从而, 说话者所表达的意图与听者所理解的说话者意图是不一致的。两者的解决方案都是通过消除欺骗, 只是格赖斯是直接拒绝欺骗, 而希弗则是通过诉诸于信息的共享, 因此两种解决方案都有其合理性。不过从现实层面考虑, 希弗对信息共享的诉求常常难以满足, 从而笔者更倾向于格赖斯所提出的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即虽然理论上确实存在无穷倒退, 但是现实中却不存在, 因为人们不会具有那么复杂的意图。

参考文献

- Grice, P. Meaning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7(3).
- Grice, P. Utterer's Meaning, Sentence-Meaning, and Word-Meaning [J].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1968(3).
- Grice, P. Utterer's Meaning and Intentions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9(2).
- Schiffer, S. *Meaning*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 Strawson, P. F. Intention and Convention in Speech Acts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4(4).